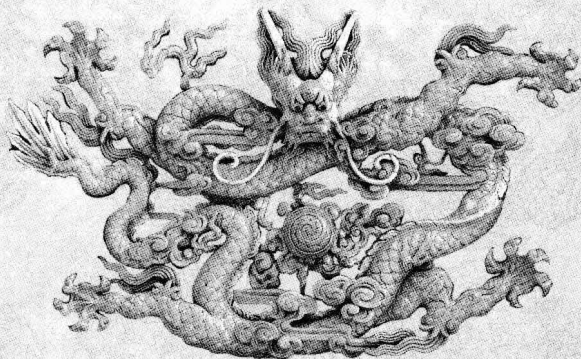


明史全鑒

主編 鄧雪妍

第三卷



紅旗出版社



第八章 怠朝政崇鬼祀神

君门万里

朱见深在位 23 年，虽不算太长，却也不算太短。在明朝的十六位皇帝中，他仅次于神宗朱翊钧（在位 48 年）、世宗朱厚熜（在位 45 年）及太祖朱元璋（在位 31 年）而居第四位。但在士大夫们看来，朱见深充其量只是认认真真做了一两年皇帝。事实上，他也只是在即位后的一两年里，才多一些公开的活动，然后便进入了半休眠状态。赵翼《陔余丛考》说：“自成化至天启，一百六十七年之间，其间延访大臣，不过弘治之末数年，其余皆帘远堂高，君门万里。”

明朝前期的几位皇帝都是亲自处理朝政的。即使是朱见深之父英宗朱祁镇，虽说是缺乏长进，昧于世事，却也不敢稍有懈怠，用人行事之际有不明之处，正统时是请教司礼监太监王振，天顺时则征询大学士李贤的意见。李贤作为当事人，曾不无自得地说：“凡左右荐人，（上）必召贤（李贤自称）问其如何。贤以为可者即用之，不应者即不行。”又说：“上躬理政务，凡天下奏章，一一亲决，有难决者，必召贤商议可否。”

如果说朱见深什么事也不做，那倒是冤枉，有几件必须要做的事他还是在内阁和司礼监的督促下按规矩做的。第一件是每年正月往南郊大祀殿祭祀天地。朱见深在位的 23 年里，这件事是遵循得最好的，没有一年不去。而且，每次祭祀之前，都要在奉天殿戒飭文武群臣，致斋三日，以示诚意。第二件是每年正月初一去奉先殿及仁寿宫向祖先及皇太后行礼，然后出御奉天殿，接受群臣及周边各少数民族贡使的朝贺。除了遇上大的天变，如日食等，这正月初一的朝贺礼，朱见深是坚持下来了。第三件是批答奏章。凡有群臣上疏，虽然基本



上是批给有关部门处理，但毕竟“留中不发”的很少，有时也还亲自动手批出几条意见。不过，到底有多少是朱见深自己批的，有多少是司礼监按朱见深的意见批的，又有多少是朱见深根本不看、直接由司礼监批的，则无从考究。第四件是视朝。如果以为朱见深在位期间很少上朝，那也是误解。恰恰相反，除了极特殊的情况外，他是天天上朝的。只是上朝时并不多说话。其他如遇早求雨，遇潦求晴等等，也还是勉力为之。

遇上心情好，还偶尔去西苑看练武，因为他自己做太子时就喜欢骑射。不过，每次看了练武，总让他失望，武官们的骑射技术虽然与他比还是拿得出去，但也不见得强多少。

成化九年（1473）四月二十二日，按理是经筵日，但这天是仁祖淳皇帝（太祖朱元璋的长兄朱世珍）的忌日，朱见深从奉先殿行礼出来，但见阳光明媚，初夏的北京，尽扫往日的郁闷之气，不由得精神振奋。与其坐在文华殿呆头呆脑听翰林官讲课，倒不如出去散散心，也驱赶一下自去年春天以来因皇太子祐极去世而带来的阴郁。朱见深的车驾出西华门，来到西苑皇家练武场。40年后，他的孙子武宗朱厚照便在这里建豹房、立西官厅。皇帝看比武应是看高层次的，于是在京师的公、侯、伯诸勋臣以及充任京营坐营、把总等官的都督、都指挥使、指挥使等高中级军官当场演习骑马射箭。结果，连中三箭的只有四个人，三箭射中两箭有23人，只射中一箭的有99人，其余的一箭也没射中，还有在马上无法开弓放箭及连弓也拿不住的。

朱见深本来想开开心，结果扫兴而归，指责了提督京营总兵官抚宁侯朱永等人一番：武备此般懈弛，“皆尔等不严训练之过。”“使此辈总统部伍，安能递教军士。”尽管朱永等人因此而将把总李胜等四十六人黜回老营，但朱见深在半年后再往西苑检阅时，仍有把总九人射不中靶。从此以后，他再也懒得去看练武了。

偶尔他也去国子监看看。那是成化元年（1465）三月初十，朱见深在太学生李贤、陈文、彭时以及六部、翰林院官的陪同下，身着皮弁，先在集贤门给先师孔夫子行了四拜礼，然后到国子监正堂彝伦堂，听祭酒司马恂、司业张业

明宪宗
朱见深
明孝宗
朱祐樞



明武宗朱厚照像

讲书。这个地方当年宣宗皇帝曾来过两次，如今“今上”驾临，使师生们大为激动。不过，朱见深也只让他们激动了一次，以后就不再来了。

最使文臣们不满意的是，朱见深对他们苦心安排的经筵讲学不感兴趣，尤其不愿召见大臣。

天顺八年（1464）八月初二，朱见深即位后的第一次经筵在文华殿举行。对这种讲学，他在做太子时就领教过了。现在做了皇帝，还得规规矩矩坐在那里听讲官们的教诲，多少有些厌烦。说实话，他并不是不愿读书，而是对经筵讲学的方式和内容不感兴趣。以初开经筵那天李贤讲的《大学》和陈文讲的《尚书·尧典》来说，朱见深早已滚瓜烂熟，但仍耐着性子听。好容易经筵结





束，讲官们在皇帝御赐的筵席上议论着日讲内容，但皇帝却在盘算如何逃避这件苦不堪言的事情。在那次经筵以后，接下来是没完没了的“日讲”。夏日尚可，如果是在冬天，天寒地冻，寅时起床，没法睡懒觉，天刚蒙蒙亮就要上朝，上完朝又去文华殿听侍讲官讲学。如果是和阿丑等人讨论戏曲，与吴伟等人讨论书画，与钱能、梁芳鉴赏古玩，与万妃、邵妃打趣说笑，或者和方士们研究养气练神，那自然是其乐无穷。可这《四书》《五经》枯燥无味，《通鉴》、《史记》前车已远，实在是打不起精神。

但不管皇帝愿不愿意喜不喜欢，内阁和礼部、翰林院及其他有关部门仍是按祖宗规矩办，而且积极性很高，不但要讲先哲曾子的《大学》，还要讲宋儒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不但要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还要讲各家的考异考证。对于这些，朱见深有些无可奈何，外有内阁大学士们喋喋不休的上言，内有司礼监太监们卑词正言的讽谏，上面还有皇太后的不断督促，只得勉力而为。

当然，朱见深的性格是外圆内方，顺从中有执拗，宽厚中藏狡黠。既然经筵日讲不好不去，便来个消极抵制，任你讲官说得天花乱坠，他硬是死活不开口。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让你讲得自觉无聊，可以早早收场。讲官们对这位不冷不热、不言不语的主子也无可奈何，讲学犹如对牛弹琴。到成化六年（1470），一位来自福建莆田的经筵展书官、翰林院编修陈音忍无可忍，借灾异上疏力言此事，想把皇帝的金口撬开：

养德之要，莫先于讲学；讲学之功，莫切于好问。今陛下虽日御经筵，然势分尊严，上下相隔。上虽有所疑而未尝问，下欲有所陈而不得尽。愿陛下退朝之余，择一二儒臣有学行者，引至便殿，从容赐坐，有疑辄问，务使圣心涣然，如天间日皎，则以之正心、正家、正百家、正万民，而亿万载太平之业基于此矣。

这陈音是位饱学之士，为人负气节，后来闯出很大的名气。司礼监太监黄赐的母亲去世，部、院、寺、司诸官都前往悼念，侍讲徐琼也动员翰林院众官



前往，陈音当众斥责：“天子侍从臣，相率拜内竖之室，若清议何！”虽然今天看来，陈音不免偏颇，而且也没有意识到宦官地位的法律性变化，但当时的舆论便是如此，众翰林固是肃然起敬，徐琼也自觉惭愧。汪直命韦瑛领西厂校尉夜入兵部郎中杨仕伟家，考掠家属，追查杨华所说的行贿礼物。陈音与杨仕伟比邻而居，听到杨家骚扰，爬上墙头大声呼喊：“尔擅辱朝臣，不畏国法邪！”校尉们见竟然有人敢于干预，反问道：“尔何人，不畏西厂？”陈音却不吃这套，理直气壮地通报姓名：“我翰林陈音也！”这件事传到内廷，宦官们也挑拇指称赞。但那是几年之后的事。而在成化六年，朱见深对陈音却没有什么印象。当然，即使有印象，朱见深也不会因为他的一番言论而改变自己的原则。

不过，朱见深偶尔也会表现出对史鉴的兴趣，这自然是文官们求之不得的。

成化九年（1473）二月，翰林院史官们根据朱见深的要求，对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作了考订。这位皇上的要求也很特别，原来插在纲目之中的后儒的考证、考异统统删去，另外附上宋儒王逢的《集览》和尹起莘的《发明》。这样做是为了看起来轻松方便，又保存了基本参考资料。朱见深对自己的这一主意很是得意。见到翰林院送上的新编纲目，一时兴起，亲自写了一个序言，让付梓印行。这却是翰林官们没有想到过的。校订、印行《资治通鉴纲目》之后，朱见深兴致不减，又命内阁组织人员编纂《宋元续通鉴纲目》。到成化十二年十一月，《续资治通鉴纲目》修成，朱见深又作了一序，这次倒是修书史官们所预料到了的。据《明宪宗实录》和《明史·艺文志》记载，翰林官曾在成化十四年五月，编辑了朱见深的《御制诗集成》四卷，可惜今已失传（或笔者孤陋寡闻，未曾寻得），故这两篇序文倒是难得的资料。

既然是皇帝自己下旨编书，劝人向学，文官们便决不会放弃机会规劝不愿讲学的皇帝。翰林院编修谢铎借古喻今，上了一道奏疏。奏疏递上去，朱见深知道必无好事，不过要见识一下这位史官的文采和学问。谢铎开篇便将了朱见深一军：“是书（《通鉴纲目》）师法春秋，实经世之大典、帝王之龟鉴。陛下发自宸衷，重加考定，必将日御经筵，命儒臣讲论陈列，力求善恶兴亡之大者，以为劝惩。以实见于践履设施之际以大起治道。不为文具故事，以备太平之美



观也。”接着，谢铎举了两位反面教员例子：“夫宋神宗集是书而不能讲，理宗讲是书而不能用，故不免纷乱削弱而终不能复其祖宗之盛治。”编书而不讲学不行，讲学而不实行也不行，因此，谢铎提出：“治道之本，莫先于讲学。”他列举了当时的种种弊端，措词激烈，最后归结为一条，是皇帝没有专心致志读《资治通鉴纲目》这样的好书，尤其没有认真讨论这部书所提倡的治国安民的道理。

看了这份奏疏，朱见深既没有发怒，也没有理睬，仍是那个原则，以不变应万变，发给有关部门了事。至于经筵日讲，仍是一言不发。

如果只是不愿和儒臣讨论经史，那倒罢了。从朱见深即位开始，就根本不单独召见大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是由司礼监太监内外联络，或通过内监口头传达，或让各官用文字陈述。这样一来，不仅是五府、六部各机关长官无法和皇帝一起讨论国是，就连代皇帝起草诏书、批答奏章的内阁大学士及学士们，也只能通过司礼监来获得皇帝对具体事情的意见。外廷整个和皇帝隔绝了。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这都是相当危险的。皇帝不见大臣，意味着不问政事，如果司礼监利用内外隔绝进行专权，那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为此，外廷官员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要求不是通过宦官而是直接与皇帝进行对话，当面陈述对国家政策及法令乃至对皇帝家事的看法和建议。

成化七年（1471）十二月初六，令人担忧的彗星又一次出现在天际，这一次没有像成化四年九月至十一月的那次那样，前后达两个多月，但那条尾巴却出奇的大而且长，横贯东西，光芒万丈。开始是北行，犯太微星垣的上将及幸臣、太子、从官诸星；接着尾巴指向正西，横扫太微垣郎应，又犯天枪星垣，扫北斗、三公、太阳筹星，进入代表天子的紫薇垣内。其光芒之亮，正午的时候都可以看得见。帝星、北斗星、魁星、庶子星、后宫星、天皇大帝星以及阁道、文昌、上台诸星，没有不被彗星那条大尾巴扫到的。人们预感，大概这次的大灾难是难以避免的。皇宫内外陷于一片恐慌之中。

每当发生天变，尤其是大天变，宦官、佞倖们便惶惶恐恐，担心外廷文官谴责他们贻误国家大事。外廷一些声誉不好的大臣也战战兢兢，准备接受科道



成化瓷器

官的新一轮弹劾。朱见深只有到这个时候才会想起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和国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何况彗星尾巴把整个紫微垣扰得没有安宁。

彗星出现的当天，他就发布了一道由内阁草拟的情词恳切的敕谕，先是自己责备，接着要求文武群臣痛自修省。各官在作了自我检查后，照例又将球踢回给皇帝。大学士彭时、商辂更是痛心疾首，认为祖宗朝凡有庶政，都是皇帝和内阁辅臣议定而后行，唯独本朝，自李贤去世后便没有人能当面为皇帝排忧解难。因此，他们借着天变示警，力请面君言事。他们的言词婉转，却难以推却：“兹者天象垂戒，古今罕见，外人不知皇上忧勤在心，窃谓遇此灾变，视如泛常，未尝降颜一接臣下，询访民情。”请于次日即十二月十七日早朝后在便殿面君，一宽“圣心”，二息群议。司礼监怀恩等人也从中相助，劝皇帝见见大臣，看看他们有何陈说。

朱见深一来畏于天变，二来也有些难抹众人的面子，勉强答应在十二月十七日接见内阁三辅臣。旨意一传出，群情兴奋，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彭时、商辂及万安自然更觉重担在肩，各自盘算见了皇帝以后，该陈说哪些对利国利





民、弭灾消祸最为迫切的事情。一直等着这一天，这一天就要来到了，是惊，是喜，是激动，是惶恐，要说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要革除的弊病实在太多了，一时还真不知该从何说起。

十二月十七日退朝后，朱见深来到文华殿，命司礼监内使传彭时、商辂、万安，他要在这里接见内阁三辅臣。但彭时等人会说些什么，他又该怎样答复，心中实在没有定见。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彭时等人来后，几乎什么也没有说便退了出去。《明史》记载了这次会见的前后情况：

（成化）七年冬，彗星见天田，犯太微。廷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时召大臣议致。大学士彭时、商辂力请。司礼中官乃约以御殿日召对，且曰：“初见，情未洽，勿多言，姑俟他日。”将入，复约如初。比见，（彭）时言天变可畏，帝曰：“已知，卿等宜尽心。”（彭）时又言：“昨御史有疏，请减京官俸薪，武臣不免缺望，乞如旧便。”帝可之。（万）安遂顿首呼万岁，欲出。（彭）时、（商）辂不得已，皆叩头退。中官戏朝士曰：“若辈尝言不召见。及见，止知呼万岁耳。”一时传笑，谓之“万岁阁老。”帝自是不复召见大臣矣。

这段文字是根据彭时的笔记写成的，故将责任推给万安和那位告诫他“勿多言”的司礼监宦官。但彭时见皇帝时所说的两件事，第一件空洞无物，被朱见深一脚给传了回来，第二件则不关痛痒，也难免让人失望。万安后来说到过这件事，不过他却将责任推还给了彭时：“往彭公请召对，一语不合，辄叩头呼万岁，以此貽笑。”并以此告诫其他同僚：“今吾辈每事尽言，太监择而闻之，上无不允者，胜面对多矣。”

其实，就这件事本身来看，谁也不能怪。司礼监内官反复叮咛，也许像谈迁在《国榷》中所说，是怕彭时等人揭露他们为非作歹的劣迹，但也不能排除是出于好心，皇帝即位以来还是第一次召见大臣，怕彭时等人言辞过激，弄得皇帝下不了台，以后就没有这种机会了。如果这第一次会见使皇帝开心，可能



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彭时经内官提醒，加上也是第一次应召面对，不知深浅，惟恐有失礼处，自己倒不要紧，以后就难再有机会了，所以先说一些较为务虚或不甚敏感的事情，以免刺激皇帝。万安在三辅臣中排列最后，彭时、商辂不说完，是轮不上他开口的。而他在三人中又最善于察颜观色，见彭时说的两事，一在天上，一在地下，空的过空，实的又过实，也怕他一时难以控制，第三事便得罪皇帝，于是开口称“万岁”，提醒彭时注意分寸。但既呼“万岁”，就是告辞的礼节，稀里糊涂便一起出来了，徒留笑柄。

朱见深本来就不愿单独召见大臣，只因这次天变，实在吓人，不得不顺从輿情，见上一见。不料彭时说的两件事，都是三两句话甚至一两个字就可以解决的，上个疏，朱笔一批不就好了，哪里用得上郑重其事地讨论商量？

但像这样即位七八年才和大臣单独见上一面，三言两语便算了结，而且从此以后再也不召见大臣的皇帝，实在是难得一见。因此，如果说责任，这责任只能由朱见深一人承担。当然，朱见深也有他的难处，这难处还说不出口，人们自然也无法谅解。

第一个难处是朱见深得了一种类似于心理障碍的疾病，坐久了或见生人心里便发慌，便不自在，得让万贵妃陪伴他、替他按摩，才觉舒服。这个难处他曾直言不讳地告诉母亲周太后，却不能对外廷宣布，也不能有所表示，否则，岂不貽笑天下？尚铭通过揭露汪直向外界泄露宫廷隐事而打倒汪直，在这些宫廷隐事中，恐怕也包括朱见深的这个毛病。

第二个难处是朱见深还犯有口吃。他生来有些舌短，谈吐便不太顺当。《万历野获编》说：“宪宗皇帝玉音微吃，而临朝宣旨，则琅琅如贯珠。”临朝宣旨，犹如背诵课文，诵读已熟，所以能琅琅上口，恰似有些医师通过教唱歌来纠正口吃病人。但召见大臣、商议朝政却不是这样，得随时问答，这口吃就很讨厌了，既让人暗笑，又使自己丧失信心。

《菽园杂记》记载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每当上常朝时，诸司奏事，如果准许实行，朱见深一般只说一个字：“是”。以避免多发音。他本来就舌短，偏偏后来又烂舌头，连这个“是”字说起来都很困难。鸿胪寺卿施纯很体谅皇帝的



难处，悄悄向近侍人员说：“‘是’字不便，请以‘照例’二字易之。”近侍将这个主意告诉朱见深。朱见深一说“照例”两个字，觉得很流畅，问是谁出的好主意，近侍将实情告诉他。于是施纯得升礼部侍郎，掌鸿胪寺事，不久又升为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当时有人作了两句打油诗讥讽说：“两字得尚书，何用万言书！”虽是笑话，也可想象朱见深的苦处。

想当年英宗打算换太子，所谓知子莫如父，朱见深的这些毛病，恐怕也是导致英宗想换太子的重要因素。李贤从稳定局势考虑，劝阻英宗。此举固然得到舆论的称赞，却由此造就了一个不愿亲政、不见大臣的皇帝，也开了明朝皇帝不见大臣的先例。于是“帘远堂高，君门万里”，成了明朝中后期的一大政治特征。

成化七年（1471）十二月以后，朱见深再也不召见大臣，内阁也不再提出要面君，处理国事，全靠常朝面决及各衙门提出方案，内阁票拟批答。皇帝为“垂拱天子”，宰相为“万岁阁老”。后来彭时去世、商辂去任，万安、刘翊、刘吉组成新的三人内阁，遇事不争，从而得了“纸糊三阁老”的混号，六部尚书也被科道戏称为“泥塑六尚书”，最高统治机器很大程度上靠着固有的惯性运转。法纪松弛、官风懒散自然也就不可避免。

成化十二年（1476）九月十五日，负责朝议的鸿胪寺官因发现上朝的官员明显不足数额，请按各门预定数查究。经锦衣卫和鸿胪寺核查，少了一百八十多人。朱见深每次上朝，不是在奉天殿便是在华盖殿大殿内，有时在奉天门或西角门，能够见到的不过是有资格进殿或排在丹阶之上的高级官员，而那些只能站在从奉天门到奉天殿御道两边乃至奉天门外的中下级官员，‘连“御容”也看不到，天长日久，懒得起四更，待五更的自然不少。朱见深对此早有耳闻，但没想到竟有近二百人不上朝，故严旨切责：“人臣懒惰违礼，当正于法，以惩（往）后。”但他自己也从内心讨厌这繁琐而没有实质意义的朝议。每天天不亮起床，匆匆忙忙上朝，听众官高呼几声万岁，然后就散朝，各官回衙门办事，自己去文华殿听翰林官日讲，好不烦人。因此，他倒颇能理解众官的心情，说是要“正于法”，却又留一道门缝：“姑宥之。”缺朝者每人停发三个月的俸粮。



如果是在洪武时，官员们都靠俸禄养家活口，三个月的俸粮可不是小数目。但到成化，经过几番俸粮折色，已拿不到实际数目。加上商品经济开始活跃，官场作风渐趋腐败，官员们弄钱的门道多了，中下级官员中有不少人已看不上那点微不足道的俸禄。而敢于不上朝的，又多半是那些平日视法纪为蔑如、能够弄到钱的官员，对于他们来说，三个月的俸粮能值几何？

因此，朱见深这个停三月俸粮的惩罚，不仅没有起到警示来者的作用，反而助长了官员们藐视法规的风气。成化十六年（1480）五月二十日上早朝时，连朱见深自己也发现人员稀稀拉拉，不齐不整，让鸿胪寺和锦衣卫清点，不朝参者竟然达到 636 员。按理说朱见深这次该发怒了，但他比上一次还宽容，仍是那句话：“此曹不谨，懒惰朝参，法本难容，姑宥之，再犯必罪。”连俸粮也不停了。一年以后的六月初二，朝参时又少了 593 员，朱见深仍说：“姑宥之，再犯不宥。”

如此一而再，再而三，人们终于明白，皇帝有时清点缺朝官员，并不是为了整肃法犯，而是为了抓朝臣的小辫子，并故意卖人情。你们违纪，朕不追究，朕有所好，你们也别多管闲事。君父臣子，彼此彼此，大家各行其是，祖宗法度，且莫提起。

崇僧佞道

皇帝不接见大臣，不亲自向政府各部门发号施令，其实也是很难为情的事。对于这一点，朱见深并非全然没有感触，他也试图克服心理上的障碍和生理上的缺憾。但是，他的毛病又不单是御医和药物可以治理的，到后来，又增加了对死的畏惧和对长寿的渴望，于是便自然而然地向儒家正统学说所排斥的迷信与科学的结合物——宗教与方术寻求帮助和解脱。

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几千年中，一方面不断与各种愚昧和迷信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又从来未曾真正摆脱过愚昧与迷信。况且，愚昧与智识、迷信与科



学又往往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很多时候，人们在摒弃迷信、抨击愚昧的同时，总是连同迷信表象下的科学、愚昧包容着的智识一道摒弃、一道抨击；而在寻求科学、挖掘智识的同时，又总将附着于科学之中的迷信、充斥于智识之中的愚昧一起收藏。朱见深和他的佞倖以及外廷的正直官员们，正是分别在这两个方面进行努力。

朱见深首先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力量，于是他找到了宗教。其实也用不着去找，僧、道两家从来就向包括帝王在内的所有人众敞开大门。

明太祖是位精明的君主，虽然他自己就是靠投身明教而发迹，却深知僧道既可借以成事，也可败人家国，因而对僧、道二教进行整顿，并严加控制。僧教划定为三等，一是“禅”；二是“讲”，亦称“讲法”；三是“教”，亦称“瑜伽”。道教划归为二，一是全真，二是正一。其他在民间流行的如明教、袄教等，尽行禁止。正一教本为天师教，明太祖召见第42代天师张正常时认为：“天岂有师哉？”改名正一嗣教。僧寺道观，每一个府、州、县，只能各留一个，僧、道人数，每府不能超过40人，州30人，县20人。男子四十岁以下，女子五十岁以下，不得出家。又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通经典者给与度牒，不通者还俗为民。但对“番僧”即来自乌斯藏的僧人则较为优待，主要是考虑通过笼络上层僧侣来加强对青藏地区的控制。

但是，在没有产生新的宗教及精神信仰之前，僧、道两教是限制不了的。明太祖自己就曾为诸子挑选高僧，既为僧师，又为已故马皇后诵经荐福。明成祖更以僧道衍为谋主，起兵靖难，入主南京，后又大修太和武当山宫观，寻找张三丰踪迹，大封乌斯藏僧，使得天下纷纷扬扬。从宣德九年（1434）大慈法王释迦也失留住京师及正统四年（1439）王振修大隆恩寺起，朝野上下更掀起了一股崇僧佞道的浪潮。

查继佐《罪惟录》认为，在明朝16位帝王中，溺于僧、道两教最深的，是宪宗朱见深和世宗朱厚熜。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则指出了两朝的区别，嘉靖朝是重道不重僧，成化朝却是僧道俱重。

待遇最高的自然是“番僧”。成化时受封的“番僧”主要来自乌斯藏，另



外还有朵甘。封号字数最多的是劄巴坚参，叫“万行庄严功德最胜智慧圆明能仁感应显国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刚普济大智慧佛”。除“法王”和“佛”为法名，封号达35个字，比元世祖赐给八思巴的封号还多两个字，比太祖、太宗、仁宗、宣宗、英宗的尊号两倍还多。当然，这也不是朱见深的创举，当年成祖赐昆泽思巴、宣宗赐释迦也失也是35个字。但朱见深所封的其他五花八门的封号却令先人黯然失色。与劄巴坚参同时受封的是他的三位弟子。劄实巴封“清修正觉妙普兹护国衍教灌顶弘



马皇后画像

善西天佛子大国师”，锁南坚参封“静修弘善国师”，端竹也失封“净慈普济国师”。此后，劄实巴等六位“西天佛子”进位“法王”，其中领占竹封为“万行清修真如自在广善普慧弘度妙应掌教翊国正觉大修法王西天圆智大慈悲佛”。其他诸如西天佛子、“灌顶国师”、“灌顶大国师”、“禅师”，等等，不计其数。

道士中封号最尊的仍是正一嗣教张真人。天顺八年（1464）六月，朱见深将张元吉的封号由“冲虚守素昭祖宗法安恬乐静玄同大真人”改为“体玄悟法渊默静虚阐道弘化妙应大真人”，虽然都是14个字，但规格却不可同日而语。另一位道士王文彬的封号则是“静一冲元守道清修履和养默崇教抱朴安恬真人”，虽然不像张元吉那样为“大真人”，而且“掌天下道教事”，但封号却达18个字。大学士刘健曾对真人封号提出异议，认为宗庙谥号也不过16字，真人竟达18字。实际上，18字还不到头，嘉靖时陶仲文达20字，那才是最高纪录。

相比之下，由于被番僧压着，汉族和尚的地位便低得多，僧继晓在一段时间内很受朱见深的信任，也不过为国师，封号只有六个字，叫“通元翊教广善国师”。



不但自己受封，父母家人也跟着沾光。番僧为无根水，故无父母受封之说。汉人讲究孝道，即使出家为僧道，也得有孝行。所以张元吉改封号时，也为其母高氏求得了“慈和端惠贞淑太玄君”的封号；僧继晓受宠信，也念念不忘请皇帝表彰他母亲朱氏的孝行，虽然因朱氏曾做过娼妓而使此事受到一定阻力，但朱见深仍然体谅人情而答应了继晓的要求，并制止有关部对其母“孝行”进行核实。其他如真人喻道纯、王文彬的父亲赠太常寺丞，母亲赠安人等，不一而足。

番僧倍受礼遇姑且不论，即使是真人，所享受的待遇也超过了先圣孔夫子的后人。这使得读书士子大为不满。陆容曾以一事为例，表达了这种不满。

孔府嫡传在明朝袭封衍圣公，每年衍圣公赴京朝贺，沿途水陆驿站例行迎送接待，但待遇只给中等的马匹及车船、食宿，回山东曲阜时更得自行解决车船运输。而江西龙虎山的张真人却风光得多，来回都是上等的马匹、车船接送、上等的食宿款待。明代驿传由兵部管理。陆容当时是兵部职方郎中，主管此事，对这种重道而轻儒的规矩很不以为然，便于成化十六年三月向兵部尚书余子俊提出提高衍圣公朝贺待遇的意见，余子俊很是赞同。经报请皇帝批准，才使衍圣公也得到和张真人相同的待遇。陆容对自己干的这件事颇为得意，自称：“于吾道实有光云。”

僧道犯罪，朱见深也是百方庇护。

张正常虽然封为“大真人”，却是手段残忍、灭绝人性的恶棍。他利用宗教地位和民众的愚昧无知，横行乡里，强夺良家子女，诈取平民财物。稍有不顺其意者，则诬陷为伪造符象，命徒弟棍棒相加，往死里打。真人府还私设监狱，备有各种酷刑，有不服者，或用绳索绞死，或用沙袋压死，或者捆绑起来，投入深潭之中。前后有40多人死于非命，甚至有一家三口均被害死。可人们畏于真人府的权势，不敢告官，即便告官，官府也不敢受理，徒取其祸。贵溪县有位名叫蔡让的生员忍无可忍，乘巡按江西监察御史赵敬行文征询民间疾苦时，上书条陈张元吉的罪行。赵敬巡按江西时惩土豪、治劣绅，平反冤狱，也算是响当当的人物，但对于这桩案子，却不敢过问。最后还是张氏族人张留涣，因



事得罪了张元吉，自忖必死其手，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于是潜入北京，买通关系告御状，将事情直接捅到了朱见深那里。

由于牵涉到四十多条人命，朱见深也感到张元吉太过分，便命都察院和刑部派员往江西，会同巡按御史及地方法司联合调查。调查结果，张留涣所奏全部属实，张元吉被械送至京。经三法司会审及九卿廷鞫，张元吉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外廷文官们对朱见深的崇僧佞道早已不满，既然张元吉犯有如此大罪，便打算致之于死地，并乘势对僧道进行一次毁灭性打击。于是，刑部尚书陆瑜等人结合张元吉的罪行对正一嗣教进行了全面抨击：

张氏远祖道陵，自以修炼为术、清虚为宗，主张玄教，其言无稽，天岂有师，谬崇其号，子孙相传，遂为故实。至援引汉张良，以为所出。自前代间有官封，然亦不常，至宋以来，加以真静先生等号，而犹未有品级。胡元入主中国，始有封爵，令视三品。我朝革去天师之号，止称真人，延至于今。子孙不肖，往往争袭，致成讎隙。今（张）元吉所犯，律当凌迟处死，其妻子当流，其党有当斩绞者。且其先世无功于国、无补于世，宜绝其荫封，以扶植正教。仍笈其族而徭役之，无令印行符录以诬惑斯世。并毁其府第、革其所设管勾都目诸人。

但朱见深却不想将张元吉处死，倒不是怕得罪真人府，而是怕得罪真人后面无处不在法力无边的天神上帝。因此，朱见深用他的小聪明钻了陆瑜等人的空子。陆瑜等人奏上廷鞫的意见时，要求将张元吉“凌迟处死”，却忽略了加上“决不待时”几个字。按明朝法律，死刑有两种处理办法，一是立决，二是监候。立决是立即执行，监候则要等秋审时重作处理。而且“凡刑狱重犯，大逆、大盗决不待时外，余俱监候处死。”张元吉既没有谋大逆想杀皇帝，也没有杀官劫府做大盗，监候处决是说得过去的。对于外廷绝其荫封、笈其徭役、毁其府第、禁其符录的要求，朱见深则以“祖宗旧制”为由，驳了回去。



但这一“监候”，实际上是将张元吉及其子张玄庆保护起来了。经过外廷的一再催促，朱见深才对这桩案子进行冷处理，令外廷深感失望，但也在意料之中。真人府在这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大可找门路说项通融，何况朱见深本来就不想杀张元吉。当时刑部再次上疏，说张元吉“法当凌迟处死，决不待时”，朱见深继续拖延，命仍旧固禁。刑科将这道旨意驳了回去，认为时过霜降，宜从论决。如此反复三次。朱见深看看不能再拖了，牙一咬，下诏将张元吉免死，杖一百，发肃州卫充军，家属随往。

明知皇帝要保住张元吉的性命，那位使朱见深头痛的刑科都给事中毛弘仍然上了一道义正辞严、无可责难的奏疏，以示护争：

刑法者，所以持纪纲。驾驭天下，防奸宄、息寇盗、平民情，皆系于此。不以贱而加增，不以贵而加损。在人臣则执之，在天子则行之，罚曰“天罚”讨曰“天讨”，所以深明，虽天子亦不得任意出入于其间也。今罪人张元吉，夺人货财、奸人妻女，僭朝廷之制，擅生杀之权，杀无罪四十一人，有一家被杀三人者，具列十恶之条，不载八议之内……若以袭其祖之谬号天师，不欲加戮，《记》曰：“执左道以乱政者，杀不以听。”元吉正系左道之流。况又罪重恶报，岂直曲加宽者。且连年秋后处决斩绞人犯，多系止偿一人之命者。夫元吉以杀四十余人而获生，余皆一人之命而抵死，犯绞斩者则论决，犯凌迟者得不死。人心不平，天理安在？自此以后，万一罪恶再有如元吉者，又当何以处之？将欲尽法，彼得笈口；将欲宽贷，则法寝废。奈何惜一异端末流而屈天下大法，何以扶纲纪、何以驭天下，又何以抑奸宄、息寇盗而平民情乎？窃为朝廷惜之。伏望断以至公，处以大法，仍将元吉戮之于市，庶使国法昭彰、神人息怒，而死者之冤可雪，灾沴之气可消。

对于这一套，朱见深早已修炼有素，他也不作解释，只批下几个字：“事既